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總主編 韓格平

經部春秋類 〇

春秋纂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元代古籍集成

第二輯

總主編 韓格平

經部春秋類

◎

主編 韓格平

春秋纂言

(元) 吳澄 撰 張欣 點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秋纂言 / 张欣点校.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7

(元代古籍集成 / 韩格平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303-21125-8

I. ①春…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
史籍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777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CHUNQIUZUANY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mm×980 mm 1/16

印 张: 51

字 数: 7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王 强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本叢書整理與出版得到

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高校自主科研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九八五」工程基金資助

北京師範大學「二一一」建設基金資助

本書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金元春秋學研究」（16YJC720025）成果

《元代古籍集成》 編委會

顧問（按音序排列）：

陳高華

鄧紹基

李修生

李治安

楊 鐮

主編：

韓格平

副主編：

魏崇武

編委（按音序排列）：

韓格平 李 軍

李 山

劉 曉

邱瑞中

魏崇武 查洪德

張 帆

張 濤

總序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朝代。蒙古部族早年生活於大興安嶺北部、幹難河一帶及其西部的廣大地域。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統一，建國於漠北，號大蒙古國。一二七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爲大元。一二七六年，元滅南宋。一三六八年，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率衆退出中原，明軍攻入大都。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國至元順帝出亡，通稱元代。蒙古人原來沒有文字，成吉思汗時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從此有了蒙古文。一二六九年，忽必烈頒詔推行由國師八思巴創制的主要借鑒於藏文的新的拼音文字，初稱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用以「譯寫一切文字」。同時，元代統治者重視學習漢文。元太宗窩闊台于太宗五年（一二三三年）頒有《蒙古子弟學漢人文字詔》，鼓勵、督促蒙古子弟學習漢語。忽必烈亦重視吸取漢文化中的有益成份，爲藩王時，曾召見僧海雲、劉秉忠、王鶚、元好問、張德輝、張文謙、竇默等，詢以儒學治道。其後的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均較爲主動地借鑒漢族封建文化，且頗有建樹。有元一代，居於統治地位的蒙古貴族及色目貴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包括漢民族在內的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說，元代文化是由蒙古貴族主導的包容多民族文化的封建文化。其中，中土漢人和熟悉漢語的少數民族文人積

極參與元代文化建設，他們用漢語撰著的漢文著述數量極為豐富，其內容涉及到元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元代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

明修《元史》，未撰《藝文志》。清人錢大昕撰有《補元史藝文志》，「但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都目，以補前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3〕}，共著錄遼金元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三千二百二十四種，其中元人著作二千八百八十八種（含譯語類著作十四種）。該書參考了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等著作，增補遺漏，糾正訛誤，頗顯錢氏學術功力。今人雒竹筠、李新乾撰有《元史藝文志輯本》，既廣泛參考前人論著，亦實際動手搜求尋訪，「凡屬元人著作，不棄細流，有則盡錄，巨細咸備」^{〔4〕}，共著錄元代作者所著各類書籍五千三百八十七種（個別著錄重複者計為一種，如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分別著錄于詩文評類與總集類），除十一種蒙文譯書外，皆為漢文書籍。其中現存著作二千一百九十六種（包括殘本、輯佚本）。具體分佈情況如下：經部，著錄書籍一千一百一十七種，今存二百二十種；史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二十六種，今存二百七十三種；子部，著錄書籍一千零七十六種，今存四百八十八種；集部，著錄書籍二千一百六十八種，今存一千二百一十五種。與錢《志》相比，《輯本》具有兩項顯著的優點，一是增補了戲曲、小說

〔3〕（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序》，《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第八三九三頁。
〔4〕雒竹筠、李新乾：《元史藝文志輯本·弁言》，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頁。

類著作，二是每一書名之後記以存佚，頗便使用者查尋。可以說，該書是目前較為詳備的元代目錄文獻。持此《輯本》，元人著述狀況及現存元人著作情況可以略窺概貌。需要說明的是，元人著作散佚嚴重。僅據元人虞集所作詩序，可知《胡師遠詩集》、《吳和叔詩集》、《黃純宗詩集》、《楊叔能詩集》、《會上人詩集》、《劉彥行詩集》、《楊賢可詩集》、《易南甫詩集》、《饒敬仲詩集》、《張清夫詩集》、《謝堅白詩集》、僧嘉訥《崑山詩集》等未著錄於《輯本》別集類，則編纂元人著作全目的工作，尚有待於來日。

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中「總論元文化」一節曰：「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1]今以現存元代古籍為例，略述元代學術文化之盛。

經學是一門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體現儒家思想精要的古老的學問，長期居於中國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元代結束了兩宋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元代經學亦在借鑒、調和宋代張程朱陸理學的進程中，產生了許衡、劉因、吳澄等理學名家。清儒編纂《四庫全書》，收錄了約三百八十種元人著作，其中多有對於元人經學著作的讚譽之詞。例如，評價吳澄《易纂言》曰：「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評價許謙《讀書叢說》曰：「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尚

[1]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三三頁。

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評價梁寅《詩演義》曰：「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評價趙汭《春秋屬辭》曰：「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¹⁾清末學者皮錫瑞認爲元代爲經學積衰的時代，「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²⁾承認元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且有如趙汭《春秋屬辭》這樣的「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作。

元代史學是中國史學的繼續發展時期，成就顯著，著作甚豐。其中，影響較大的著作有如下幾種。一、元順帝至正年間編纂的《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皆有三朝專史舊本可供借鑒，故歷時不及三年即告竣事，且整體框架完備，基本史實詳贍，爲後人研究遼金宋歷史的重要著作。同時，順帝詔「宋、遼、金各爲一史」，解決了長期持論不決的以誰爲「正統」的義例之爭，顯示出元代史學觀念上的進步。二、馬端臨《文獻通考》。該書是一部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期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對唐杜佑《通典》加以擴充，分田賦、錢幣等二十四門，廣取歷代官私史籍、傳記奏疏等相關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介紹，篇幅浩繁，堪稱詳備。三、《元典章》。該書全稱《大元聖政國

(1) 上述引文分別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二頁、九七頁、一二八頁、二二八頁。
(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八三頁。

朝典章》，為元代中期地方官府吏胥與民間書坊商賈合作編纂的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以前元朝法令文書的分類彙編，分詔令、聖政、朝綱等十大類，六十卷。書中內容均為元代的原始文牘，是研究元代法制史與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四、《大元大一統志》。該書為元朝官修地理總志，始纂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成書于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六百冊，一千三百卷，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輿地書。該書氣象宏闊，內容廣泛，取材多為唐宋金元舊志，今僅有少量殘卷存世。

元代子書保持和發揚了傳統子書「入道見志」、「自六經以外立說」的基本特色，廣泛于預社會生活，闡發個人學術（含藝術）觀點，產出了許多優秀作品。面對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謝應芳《辨惑編》、蘇天爵《治世龜鑒》諸書推闡朱熹學說，力闢民間疑惑，探求治世方略，顯示出元代子部儒家類著作的基本格調。元代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新的進展。李冶《測圓海鏡》的成書標誌着大元術數學方法的成熟，「是當時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代數著作」。^①稍後朱世傑《四元玉鑒》用四元術解方程（包括高達十四次方的我國數學史上最高次方程），「對方程的研究（列方程、轉化方程和解方程等），朱世傑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頂峰」，「《四元玉鑒》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是有關垛積與招差問題，就其成果的水平來看達到了中國古代此類問題的高峰」。^②司農司編《農桑輯要》、魯明善

①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九七頁。

② 李迪：《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六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〇頁、二六一頁。

撰《農桑衣食撮要》、王楨撰《農書》三部農書，是元代農學的代表作。又李杲有「神醫」之譽，「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二〕}，觀其所著《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諸書，可知時人所譽不誣。

元代文人文學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吟詩作文是當時文人的普遍行爲。「近世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也，人之爲詩者不知其幾千百篇也」^{〔三〕}。與經、史、子部著作相比，元代集部著作數量最多。其中，尤以別集數量居首。現存或全或殘的各種別集（含詩文合集、詩集、文集、詞集）約六百六十種。閱讀郝經《陵川集》、姚燧《牧庵集》、劉因《靜修集》、吳澄《吳文正公集》、趙孟頫《松雪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歐陽玄《圭齋集》、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虞集《道園學古錄》、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等別集，可以從其不同個體的視角，瞭解元代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同側面，瞭解作者個人的情感與情操，體味元代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而閱讀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馬祖常《石田集》、李昉《菊潭集》、薩都剌《雁門集》、迺賢《金台集》等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創作的詩文，則於前者之上，平添了幾分讚歎與欽敬。蘇天爵《元文類》，選錄元太宗至元仁宗約八十年間名家詩文八百餘篇，後人將其與宋姚鉉《唐文粹》、宋呂祖謙《宋文鑒》相提並論。元代雜劇與散曲創作成就顯著，後人編輯的雜

〔二〕《元史·方技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五四〇頁。

〔三〕（元）吳澄：《張仲默詩序》，李修生：《全元文》，第十四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六五頁。

劇或散曲總集有所收錄，較全者，有今人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與隋樹森《全元散曲》。

總之，元代古籍內涵豐富，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居於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元代古籍，既有少量當初的刻本或抄本，又有大量明清時期的翻刻本、增補修訂本、節選本或輯佚本，版本系統複雜，內容互有出入，文字脫訛普遍，大多未經整理，今人使用頗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決心發揚我校陳垣先生發端的整理研究元代文獻的學術傳統，充分利用此前編纂《全元文》的學術積累，利用十年至二十年時間，整理出版一部經過校勘標點的收錄現存元代漢文古籍的大型文獻集成——《元代古籍集成》。我們的研究計畫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及相關院、處的充分肯定與大力支持，在「二一」、「九八五」、自主科研基金等方面提供科研資金予以資助；海內外學界師友或給以殷切勉勵，或積極參與我們的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在出版資金、編校力量方面予以積極投入，在此，謹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我們深知，完成這樣一項巨大工程，不僅耗時、費力，還要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我們將盡力而為，亦期待着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指教。是為序。

韓格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

點校前言

吳澄（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撫州崇仁（今屬江西）人。吳澄年幼即許心朱子之學。十五歲始往來饒魯之門人程若庸門下，按照師承，爲朱熹四傳弟子。宋咸淳六年（一二七〇）領鄉薦，春試不利，還構草廬，讀書講學其中，人稱「草廬先生」。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程鉅夫江南訪賢，隨至京師，次年以母老辭歸。後因董士選舉薦入京。大德末，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尋以疾辭。至大間授國子監丞，陞司業，未幾辭歸。至治三年（一三二三）超拜翰林學士，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任經筵講官，修《英宗實錄》，復棄歸。元統元年（一三三三）卒，年八十五，謚文正。吳澄生前即有盛名於世，但是「出處久速，道義以之。其稽立於朝，未嘗三年淹也」^{〔一〕}，終其一生，主要是究心學問，以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爲務。其爲元代巨儒，與許衡齊名，號稱「南吳北許」。吳澄自幼以接續朱熹學統自任，立志完成朱熹在五經上未了的遺志，自覺抵制朱門後學獨尊四書，輕棄五經之學術態度，加之其廣博的學術追求，使得吳澄留下了數量巨大、內容博雜的著述，包括《吳文正公集》一百

〔一〕（元）虞集：《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全元文》第二七冊，第一七八頁。

卷、《易纂言》十卷、《易纂言外翼》八卷、《書纂言》四卷、《儀禮逸經纂言》三十六卷、《春秋纂言》十二卷、《春秋纂言總例》七卷、《孝經定本》一卷等，其經學著述最引人注目。

《春秋纂言》十二卷，吳澄采摭諸家有關於《春秋》一書之傳注，並間以自己的觀點加以闡述而成。吳澄最遲在一二七〇年就已經開始進行《春秋纂言》的著述，最後成書於天曆元年（一三二八），書名「纂言」，殆有彙聚眾解之意。全書所采經文多以《左傳》為主，《公羊傳》、《穀梁傳》之異文標注於下。所采諸家傳說，三傳以下，高閏、杜預、張洽、胡安國諸人爲最多，許翰、孫覺、劉敞、程頤等人次之。凡先采舊說，後著己說者，用「澄曰」二字爲別；而經文之下緊接己說者，則略而無別。每年以《大衍曆》著其月大或月小，而推明經文所書日之干支爲某月之某日。

《春秋纂言》書成之後，又仿照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分所異，合所同，將《春秋》全經中的「例」總結爲七綱八十八目，這是吳澄分析與綜合以治《春秋》的結果。七綱首「天道」、「人紀」二篇，爲吳氏所自創，餘吉、凶、軍、賓、嘉五篇，則着眼於禮制，與宋儒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四庫全書總目》爲其辯護曰：「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閤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爲密矣。」《纂言》首附《總例》以行。書成以後，多得時人好評。但是吳澄治經繼承自宋以來刪經、改經的習氣，在《春秋纂

〔一〕（清）永瑤、紀昀：《春秋纂言》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二二五頁。

言》中割裂原先經文行款，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四庫全書總目》謂其「體例殊爲未協」，但「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頗爲公允。

在春秋學史上，宋代可以說是破陳出新的鼎盛時期，據《宋史·藝文志》，春秋類著述超過二百四十種，居經部著述之最；《經義考》所錄宋人春秋學著述，更在四百種以上，故四庫館臣謂「說《春秋》者莫夥于兩宋」^{〔一〕}。不唯春秋學著述數量多，而且產生了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春秋權衡》、胡安國《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高閌《春秋集注》、陳傅亮《春秋後傳》等品質上乘、影響深遠的名作。無論從品質上，還是數量上，都可見春秋學在兩宋的繁榮。元代的春秋學承襲兩宋之後，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發現之前，元代學者還是沿用勝朝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其結果可想而知。元儒大致只能在兩宋學術的框架下，進行局部的、細節上的推進，很難對兩宋的學術產生實質性的突破，元儒所進行的工作，更多的是對元代以前，尤其是兩宋學術進行總結，《春秋纂言》便是其中的典型。綜觀《春秋纂言》，吳澄於《春秋》創見不多，其見解都不出唐、宋諸儒樊籬。雖有不少獨創之處，也只是在細節上彌補了前儒之失^{〔二〕}，在經學史和思想史上也沒有引起足夠大的波瀾。然而此書爲吳澄重要的

〔一〕（清）永瑤、紀昀：《日講春秋解義》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二三四頁。

〔二〕如傳公二年「城楚丘」條，三傳及諸儒皆以爲楚丘爲衛地，因爲狄人幾乎亡衛，齊桓令諸侯成楚丘而封衛。獨吳澄以爲當從莊公三十二年「城小穀之例，楚丘亦是魯地。」即隱公七年，「凡伯聘魯而戎伐之于楚丘」之楚丘，只不過其地不可攷。

經學著作之一，全祖望所謂「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①，同時也是代表元代春秋學的典型著述。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明永樂年間纂修《五經大全》，其中的《春秋大全》採用吳澄《春秋纂言》的內容很多，對明代春秋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若要对元明春秋學做深入研究，那麼《春秋纂言》是無論如何也避不開的。另外書中所引諸家尤其是宋儒疏釋《春秋》之說，其中不少著述已經亡佚，幸賴《纂言》而窺其大概，因此其輯佚價值也同樣值得關注^②。

《春秋纂言》版本情況較為簡單，具有校勘價值的主要有三：其一，元刻本；其二，道光十八年重刻乾隆二十一年萬璜刻本；其三，四庫全書本。另有盧氏抱經樓抄本，現藏上海圖書館；清抄本，鈐「延古堂李氏珍藏」印，藏國家圖書館。末兩抄本未見，不叙。

元刻本《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篇作七卷，原為汪士鍾藝芸書舍、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今藏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春秋纂言》據此影印。此本刊刻最早，錯誤最少，完整地保留了《春秋纂言》的最初面貌。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萬璜將吳澄著述彙編為《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十種，

①（清）全祖望：《讀吳草廬《春秋纂言》》，《全祖望集匯校集注·鮚埼亭集外編》第二十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二八〇頁。

②如兩宋之際的學者程迥，深于《易》、《春秋》，朱熹多所稱許。著有《春秋傳》與《春秋顯微例目》二書，二書自明以後亡佚不傳，只能從宋元人徵引中得見一二，其中《春秋纂言》所引為最，多達三十一條。詳見黃覺弘：《程迥《春秋》佚說探微》，載《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二〇一一年第三期，第五三頁。

刻行於世，其中《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篇作二卷，其「天道」、「人紀」、「嘉禮」三篇作上卷，「賓禮」、「軍禮」、「凶禮」、「吉禮」作下卷。萬璜刻本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重刻，重刻本其內封面鐫「道光戊戌新鐫」、「本家藏板」。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左右雙邊，框高十八釐米，寬十二點四釐米。此本較為常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從道光重刻本來看，對其中關涉夷夏的字句改動較多。文淵閣四庫本《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體例與元刻本略同，然而亦有對夷夏字句的刪改，此為清官方抄刻書籍之通例，不復贅述。

今校點《春秋纂言》及《總例》，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為底本，校以道光重刻乾隆萬璜本（簡稱清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附以《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纂言》提要」。全部校點整理工作由張欣獨立完成。